



关于华南与东南亚民族考古的几个问题

◆ 吴梦洋
 ◆ 朱芝兰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 马天行

“华南与东南亚民族考古”是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生的选修课，由吴春明辅导。本文是2012~2013学年教学过程中师生讨论的部分内容，涉及到这一跨界区域考古的理念、方法、内容、课题与学术进展等。大部分内容都是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但本教学过程站在区域历史长河的宏观角度做全程考察，有不少独到的看法。由2012级硕士生吴梦洋、朱芝兰、马天行等整理，并经吴春明老师修订，供学界进一步研讨、批评与参考。

我们在厦大读本科时，上过吴老师讲授的《东南亚考古》课程，为什么研究生阶段改上这门《华南与东南亚民族考古》呢？

这是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考古学、历史学“区域研究”的一个很重要基础，必须着眼于“文化单位”而不是“行政区划”去探索历史，就是民族学、考古学上的“文化圈”。“文化单位”的整体性，是历史上特定族群活动的空间，文化圈的角度更接近族群的历史、古史的真实，考古研究上曾有“吴越考古”、“楚文化考古”、“匈奴考古”、“东夷考古”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具体的考古实践中，还有大量如“福建考古”、“江西考古”、“广东考古”等基于行政区划、便于文化行政管理的“课题”，这些主要是一项考古工作，实际上与历史研究为旨的考古学还有距离。

我以前给本科生开设的《东南亚考古》，是外国考古的一个专题课，同时考古专业还先后开设《中国东南区考古》，这两门课程实际上反映了中外学界在华南与东南亚区域研究上的缺乏交流、沟通的状况。华南或中国东南区考古，是中国考古学范畴

中的一个区系研究课题，局限于“当代中国”这一大的行政区划，而东南亚考古长期以来是西方学术的一个研究对象。由于中外考古学术基本隔阂，各说各话，华南与东南亚的考古学比较研究不多，带有“行政区划”隔阂的痕迹。民族学、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在全球史前、上古早期古文化体系中，“华南与东南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或“文化圈”。

东南亚地区是个古文化十字路口，中世纪以来以至于晚近时代，“外来”的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中原北方南下的汉文化圈、近古西洋殖民文化等相继传播落殖，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凌纯声先生对东南亚的“民族文化分层”研究，阐明了东南亚地区文化多样性的不同历史深度。所以，从现代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华南与东南亚之间差异很大，主要是中世纪以来在这一代活动的族群文化不同，从民族文化分层的角度来说，是中、上层与表层文化的差异。而实际上，在这些多元的中上层与表层的外来文化传播之前，东南亚地区的“底层”文化即土著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形成了今仍然分布于东南亚地区包括“南岛语族”（马来语族或印尼语族）在内的土著族群。这个土著族群文化同样分布于华南地区，就是中原北方汉人南迁之前的百越及其先民文化。因此，华南与东南亚考古，不是简单地探讨两个行政区划之间的古文化“关系”、“交流”问题，而是要更进一步，把现代的这两个行政区域，当成古文化上的一个整体看待，探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区域历史的早期，这个跨界区域存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位，即土著文化圈。华南与东南亚考古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考古发现，辅之以土著民族志材料，梳理这个“整体”、“单位”的产生、发

展与变化过程。

对于华南与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的这一跨界文化共同体,凌纯声先生以“亚洲地中海文化圈”来概括,林惠祥先生概称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前几年我曾从民族史角度用“百越-南岛一体化”来表述。中世纪以后,随着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汉文化圈、西洋(欧洲殖民)文化圈相继扩散、传播到东南亚地区之后,东南亚与华南地区以“底层”文化为特征的土著文化圈的“统一性”被弱化了,但这不影响考古学上将这一时空土著文化作为学术探索的重点。总之,从空间上圈定“华南与东南亚”考古的依据,就是史前与上古时期存在于这一“跨界”地带的土著文化圈,重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土著民族文化史是这一时空考古学的核心任务。

在开展华南与东南亚考古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强调民族考古的方法呢?

重建华南与东南亚土著民族文化史,单纯的考古学调查研究角度是不够的,运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与这一区域历史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有关。所谓“民族考古”就是民族志类比在考古学研究、解释中的运用,是美国人类学体系中在美洲与大洋洲考古学上的常见方法。人类学是“他文化的历史学”,涉及研究视野上的“主位”与“客位”的差异问题。欧美学者在开展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考古时,不会发生视野、理解的偏差,不必涉及民族考古,但当他们进入美洲、大洋洲开展土著民族的考古调查发掘时,就大力倡导民族考古。欧洲人遇到印第安人,西方人遇到大洋洲岛民,面对的是他文化的历史,他文化的考古实际上是一项跨文化的工作。美洲考古学上,当考古学家发掘一个印第安的古代遗址时,一般不敢轻易就对出土物的功能与文化内涵予以解释,而是要到附近的印第安聚落中参与观察一番,这就是民族考古学上很重要的步骤“活的考古学”或“行动考古学”的由来,其核心问题是解决考古学家的视野、观察考古学遗存的“客位”立场问题。

我国的“民族考古”实践历史不短。三四十年前中国的考古学,受古典进化论的影响很深,把恩格斯引用摩尔根的理论奉为经典,甚至把摩尔根调查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志看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在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中,常见运用摩尔根《古代社会》、《美洲土著的房屋与家庭生活》类

比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母系、父系社会问题,看似具备了“民族考古学”的完整形式,实则违背了民族考古学追求被调查研究对象“主位”立场的初衷。中国人(华夏、汉人)在中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核心地带开展考古工作,基本上是一个主位的立场与视野,本无需舍近求远、画蛇添足,以他文化的民族志左右己文化考古学资料与解释。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立考古组,开展一般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当他移居台湾之后,在台湾大学设立考古人类学系,而不是在历史系开展考古,因为台湾考古面对的主要是非汉人的台湾原住民史前文化。

华南与东南亚地区考古学探索的重点是史前、上古等早期古文化,即底层、土著文化。土著民族的后裔文化多已不是这一地区当代民族文化的主体,是现代华南与东南亚主体民族文化视野中的“他文化”。要重建华南与东南亚的土著民族文化史,无论是欧美或“本土”的考古学者,都面临“客位”立场问题,调查、研究、类比这一地区土著后裔的民族志,开展民族考古学研究,是这一时空考古不可回避的方法。土著民族的后裔,以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角色出现,从衣食住行到宗教、社会、风俗、语言等等,都不同程度低传承他们先民的土著文化遗产,与史前、上古的早期古文化考古学资料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和类比可靠性。比如华南史前、上古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百越及其先民的文化体系,如果能参照、类比百越民族的后裔文化如壮侗语族、苗瑶语族的各支系的民族志,东南地区的史前、上古文化,如果能参照、类比南岛语族、巴布亚语各民族文化,这一时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认识就会更准确、深刻一些。

当然,由于中古以来印度、伊斯兰、汉文化、欧洲各国殖民文化的相继传播,造成了这一地区古今多民族文化的“层累”,即不同时代文化圈的叠压,形成当代民族文化的复杂、多样现象,多民族文化的长期变迁、融合,土著民族文化已没那么单纯,在民族考古学类比中也应充分注意不同文化因素的区分、辨析,但不能因此不去实践民族考古学的途径。

如果说在史前与上古时期,华南与东南亚是一个土著民族文化整体,那么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证据,这个“整体”形成于何时?内涵与形态如何?

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涉及到华南与东南亚区域土著人群与文化的起源问题,如“南岛语族”等土著民族文化的起源“上限”,又涉及到世界范围人类起源、现代人起源的争论。但我们倾向于尊重现有的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成果,重视华南与东南亚土著民族文化“整体”产生于距今几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证据。

一方面,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华南与东南亚的土著人群初现于中更新世,而且有延续、传承至距今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甚至青铜时代的重要线索。比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董兴仁、吴新智等在比较研究了东亚、东南亚的化石人类材料后,发现爪哇猿人与安徽和县猿人的体质特征中,具有不同于北京猿人但又不属于进化水平的共同的特殊性状;早期智人阶段的印尼昂栋人与广东马坝人也有共同的特征,而与华北同期人类不同;同属于晚期智人菲律宾塔邦人、加里曼丹尼阿人与广西柳江人的歧异系数,要小于柳江人与山顶洞人的歧异系数。华南、东南亚远古人类体质特征的共性与延续,或可认为是“蒙古人种南部类型”(即蒙古人种海洋系)出现的最早证据。有如,朱泓对河姆渡、昙石山、河宕、鱿鱼岗、甌皮岩等华南新石器、青铜时代遗址中的人骨标本测量研究中,提出这一时期的“古华南类型”不同于华北。可见,华南与东南亚土著人群出现于远古时代,而且稳定存续至上古时期。如果进一步开展对华南、东南亚的海洋蒙古系、海洋尼格罗系等人群的体质人类学调查研究,不但有益于认识华南东南亚区域人群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探索这一区域类型的延续、发展及在当代人群中延续、积淀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当然,如果联系世界范围古人类起源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现代人起源的学术争议,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传统的化石古人类学发现,现代人类是100多万年之前从非洲走出来并扩散到旧大陆各地的直立人、早期智人的后代,前述华南与东南亚人类化石材料所展示的“蒙古人种南部类型”与新石器、青铜时代“古华南类型”的延续性与此吻合。然而,最近二三十年来,新的分子生物学通过古人类与现代人亲缘关系的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现代人与所在地区发现的远古时代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没有关系,现代人是10万年前左右出现并“走出非洲”、扩散世界各地并取代当地的早期人类。但是,

迄今考古学界对分子生物学在现代人起源研究上的实践还有很多忧虑,包括分子生物学所揭示的特定古人类与现代人关系的时间深度、化石人类提取古DNA的代表性等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东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体系中,主要源流于南部的砾石石器工业与主要源流于北部的石片工业系统(包括匭河-丁村系的大石片石器传统和北京-峙峪系的小石器传统)明显有别。华南与东南亚的砾石石器文化传统,奠基于中更新世,陕西蓝田公王岭、湖北石龙头、湖南澧县鸡公垱、福建三明万寿岩、广西百色盆地等砾石石器文化,经过数十万年的发展、进化,更新世晚期已经遍布华南各地,尤其是华南沿海的赣、闽、两广,砾石石器文化总体面貌更趋一致。而在过去百年的东南亚考古学上,同样的砾石石器工业同样发现于中南半岛的缅甸安雅沙(Anyathian)、越南山韦(Sonvian)、泰国邦高(Ban kao)、马来西亚淡邦(Tampun)、东南亚群岛的加里曼丹岛尼阿(Niah)、爪哇岛巴其丹(Patjitanian)、吕宋岛的利万(Liwanian)、巴拉望岛的塔邦(Tabon)等。万年前后,华南至东南亚之间的这个砾石石器文化传统,共同演化成在东亚、乃至全球都具有特殊性的区域性“中石器”文化,这一文化首先在东南亚考古上以“和平文化”(Hoabinhian)著称。与“和平文化”同一类型的遗存在华南发现很多,就是以洞穴介壳堆积为特征的更、全新世地层中的文化遗存,其主体内涵本地区旧石器文化的主流——砾石石器文化传统的延续,在两广山洞如白莲洞、甌皮岩、独石仔、黄岩洞下层、道县各洞、落笔洞等几十处洞穴遗址中都有发现,它是砾石石器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技术突变与文化更新,突出的作品砾石石器的磨刃、穿孔技术,并透露出这一传统流向华南与东南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线索。总之,奠基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华南东南亚砾石石器文化传统,几乎与上述体质人类学上“土著人群”分布的时空重叠,是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土著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早在几十万年前前的中更新世中期,华南与东南亚就出现了相当“统一”的人类与文化,而且这一“整体”还有延续至全新世的线索,那么万年前后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万年前后的华南与东南亚区域文化发展有何特殊性,在文化史上有何意义?

万年前后是人类文化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冰后的全球气候与环境骤变、“现代人”阶段人类的出现、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变化等,都出现于这一时期。对这一阶段的文化史,人类学、考古学界主要关心的是所谓“新石器时代革命”即从采集到农耕、从狩猎到畜牧、从游牧到定居、从洞居到平地聚落、从打制到磨制石器、从前陶到陶器出现等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可能与世界范围考古资料所展示的以变革为主的客观史实有关。

但在华南与东南亚,受生态环境的影响,万年前后古文化的延续性显著,并与新阶段的特征共存,在东亚石器时代考古学上显得非常独特,在文化史上意义重大。在聚落形态上,洞居聚落是东南亚“和平文化”与华南中石器、新石器早期文化定居生活的代表性形态,是旧石器时代聚落形式与新石器时代定居生活方式的有机结合。在经济生活上,采集狩猎与农耕畜牧等多样性共存,在山地丘陵地带,采集狩猎的生存方式在很长时间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这一“富裕的采集狩猎生活”既延缓了生产性经济的出现,又催生了以块根等旱地作物的栽培为特征的特殊农业生产内涵。在物质文化上,这一时空文化是东亚地区原始制陶、磨制石器等等率先发生的重要区域,是文化史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但这一时期石器工业的主流仍然是打制的砾石石器和穿孔、磨刃的砾石石器。史前文化继承了更新世中期以来的砾石石器传统并发展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地区特色的文化因素,砾石石器器形规整、对称,作为新阶段标志的穿孔石器、磨刃砾石石器和单面周缘打击的盘形苏门答腊式石器都是在砾石石器的基础上产生的。从纵向的比较看,“穿孔、磨刃的砾石石器”涵盖了历史的传承与特性,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在中石器时代的发展、并在新石器时代传承,是华南东南亚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万年前后华南与东南亚区域族群文化延续发展而未出现截然更迭的重要证据。从横向看,这个技术形态与其他地区同期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如华北的细石器文化)完全不同,细石器文化在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进程中渐趋萎缩,不具有发展的生命力,而穿孔、磨刃的砾石石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开启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工艺技术的主要源头。可见,万年前后的华南与东南亚区域历史包含了诸多特殊的内涵、有价值有潜力的学术课题,需要考

古学者做进一步的探索。

面对“新石器时代革命”所带来的物质文化与技术形态的“骤变”,考古学家在思考世界上许多地区万年前后的文化史时,多喜“传播论”而恶“演化论”,甚至忽视不同地区社会历史进程的差异和考古学资料的客观事实而千篇一律地以文化的“入侵”、族群的“征服”去解释新阶段的新文化因素的出现。在华南、东南亚史前考古学上,文化传播论、征服论同样是学术主流,许多著名的学者从“今南岛语族”的文化内涵出发,主张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地区“农耕的”、“制陶的”、“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的”“南岛语族”人群是完全不同于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采集-狩猎人群的一群新的人类文化,是外来文化入侵、外来文化征服的结果,他们描绘出最古老的“南岛语族”人群是台湾新石器时代土著,甚至与台湾的旧石器时代长滨文化都无关。这一套论述割裂了前述以内在发展、进化过程中的砾石石器为特征的华南与东南亚旧石器、中石器甚至新石器文化的一脉相承的延续、发展关系。因此,万年前后包括华南与东南亚在内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延续性特征,在重建这一区域源远流长的土著民族史、文化史上的许多关键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而这方面还有很多的考古工作需要梳理。

前面提到华南与东南亚的土著文化的主流地位持续到中世纪,随着印度、伊斯兰、汉文化等相继传播才终止。华南与东南亚之间新石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统一性和相对独立性格局有何证据呢?

华南与东南亚之间的土著文化地带,地处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明区与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古印度文明区之间,前述万年前后东南亚和平文化展示了初期新石器文化统一性、区域独立性的端倪。进入新石器、青铜时代鼎盛期后,石玉器、陶器、青铜器、聚落建筑、墓葬形态等物质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得这一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与分区特征逐步显露,但仍从宏观上表现出强烈的共性与持久的延续性,如考古学者间先后讨论的有段石铈、有肩石器、双肩铜器、印纹陶等文化因素,民族史学者讨论的华南百越与南洋马来人的同源关系、从百越到南岛的源流关系等,重点都涉及这一区域新石

器与青铜时代文化的统一性与相对独立性。

比如以有段与有肩为特征的工具组合,是华南与东南亚新石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群,中外学者相继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以有段、有肩为特征的稳定的器物组合代表了这一时空特征浓厚的土著文化传统。首先在空间上,有段石器相对密集地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中国东南一带,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扩散到华北、东南亚群岛、西南太平洋群岛等地,有肩工具相对密集地分布于岭南西部、西南与中南半岛,并扩散到南亚次大陆,但两者的分布地域不能截然分开,甚至可以说是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华南、东南亚半岛和东南亚群岛间重叠交叉分布。其次在源流、体系与传播轨迹上,戈尔登(Heine-Geldern)、拜雅(H.O.Beyer)、林惠祥、达夫(R.Duff)等先后从单纯的类型学角度对这一时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发展谱系进行研究,傅宪国强调地层学与共出关系的证据梳理两者的源流体系,基本上都确立了从华南大陆发生,向南、向海洋的发展与传播的轨迹。在文化传统上,有段、有肩器物构成的区域文化传统是显而易见的,即自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出现,之后有段石锛、有肩石斧、有肩石锛、有肩石铲、有段有肩石锛等交叉发展,至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还发展为有肩铜斧、有肩铜钺甚至有肩铜锛,形成一个延续发展的稳定的器物(工具)群与文化传统,与这一区域新石器、青铜与早期时代土著文化的统一性与相对独立性、即百越先民及南岛语族的源流史相吻合。

认识华南、东南亚新石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传统,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体系是最根本的依据。林惠祥、吕荣芳先后提出印纹陶是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带新石器文化的特征之一,李伯谦、彭适凡等则依据地层关系和类型学分析,对华南的印纹陶文化遗存进行了深入的分区、分期研究,为探索这一区域新石器、青铜文化体系奠定了基础。诚然,从微观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说,华南至东南亚间早期古文化跨越了较大的时空,该区域内新石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陶器群组合有较大的时空差别,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及其谱系,但从宏观角度看,处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印纹陶文化又具有分地带、多区系而一体的特点,尤其是以几何形纹(拍印、刻划、彩绘等)陶器和圜底器、

圈足器为根本特征的文化传统,在东亚古文化体系中显示出浓重的特色。当然,这一时空文化谱系的建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华南与东南亚新石器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土著文化进一步考古学探索,今后还要注意哪些有潜力的重要学术课题?

要真正系统地厘清华南与东南亚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的统一性、独立性与多样性,还还有许多重要的课题要做,这正是华南东南亚民族考古工作的潜力与魅力所在。

第一,建立华南至东南亚新石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总谱系,为进一步比较研究、历史重建奠定基础。现有的研究基础,华南的长江下游湖网平原、赣鄱流域、闽江流域、粤东闽南、台湾岛、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等为若干主要的区系,东南半岛上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湄南河流域与马来半岛、呵叻高原等也是几个重点区系,东南亚群岛上吕宋、巴拉望、加里曼丹等分别都有特征显著的地方文化。今后应进一步广泛收集、整理这些区系的新石器、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资料,以地层与共出关系为主要依据,通过类型学排比,逐步建立起各个区系的文化发展序列与时空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异同与亲疏远近程度的类聚分析,构建早期古文化内在关系的总谱系。单纯的时空结构,并不能体现古文化的内在关系与民族历史,比如我们曾尝试将华南地区十多个区系的新石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类聚”为三个地带的谱系关系,如果考虑华南与东南亚之间早期古文化的整体性,其谱系蓝图就要重新分析与研究。

第二,作为华南与东南亚现代主体民族的“他文化”,在考古学文化谱系建构的基础上,重建土著民族关系史,是进一步开展多方面与多层面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的前提。考古学在探索先民文化形态、经济生活、社会组织等具体文化内涵之前,要搞清楚创造这些文化内涵的主体。华南至东南亚区域所具有的稳定的考古学文化统一性与相对独立性,应该跟古代稳定的族群有关,这一时空土著族群的不同支系,从新石器时代定居聚落与农耕经济出现,到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相继建立若干方国社会,族属应未有大变。林惠祥在南洋马来族与华

南古民族关系的理论中,南洋马来族就是南岛语系的印尼语族,他阐明了华南与东南亚土著民族源流关系的基本框架,后来张光直、贝尔伍德等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也是这个思路,就是“百越—南岛”一体的民族史蓝图。未来的课题是,结合汉文史籍等早期“他文化”民族志,进一步探索上述不同区系的新石器、青铜与早期铁时代文化谱系不同环节的族属或族群分支。在华南,基本上在百越民族史的框架内,探讨考古学文化与汉文史籍所记载的吴、于越、杨越、东瓯、赣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不同这些支系的民族文化史。但由于周汉时代华夏的文化南播尚未到达东南亚,汉文史籍中只有少量关于红河三角洲东山文化的创造者瓯骆的少量历史线索,东南亚文化谱系中其他环节的民族史,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第三,聚落形态与土著社会的民族考古研究。环南中国海的华南与东南亚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相间,陆地与海洋联系,土著先民适应多元的地理环境,新石器时代以来创造了多样的、有特色的聚落形态,既是特殊的生存方式,又是渐进的社会形态的反映。比如,干栏式建筑是学者较多讨论的话题,是这一区域建筑物的常见结构,从河湖水乡、内陆山地到沿海港湾,都可以看到这种结棚巢居的建筑形式,但它仅仅是聚落形态中的一个因素。又如,随山洞而居是华南与东南亚区域聚落形态的又一重要特征,与这一区域山地环境、洞穴发育、远古时代穴居传统延续等都有关系,而且从土著的“洞蛮”聚落到近现代各民族共享的“洞穴人家”的跨文化传承,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的民族考古讯息。再如,海洋性聚落的问题,从贝丘等原始海洋性聚落,到青铜时代河口港湾出现的一系列海洋性政治经济中心,透露出海洋文化在塑造华南东南亚聚落形态中的关键作用。自史前至上古,特殊的聚落形态关联着土著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特殊内容,聚落形态的调查研究,应该结合生态环境、群居形态、经济生活、宗教文化、社会组织等,探讨自然与人文的关系、群落的布局与结构、社会与等级功能、聚落传统的古今传承与演变等。

第四,土著经济生活史的民族考古研究。山海环境不仅制约了特殊的聚落形态,更为各民族提供了独特的生存方式,从新石器、青铜到早期铁器时

代,并不同程度地传承于近现代民族志中,土著先民的经济生活、产食方式内容丰富、独具特色。从广谱的采集、狩猎到多种块根、种子植物的栽培,从区域性稻作农业的产生及其向山地、海岛的传播,非本土起源栽培植物的引进,沿海与岛屿的海洋捕捞等,不同形态、不同产食内容的经济史及相关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贸易交换、与特定经济生活相关的宗教文化内容等,在这方面传统考古学的采样分析、科技考古的鉴别研究、民族考古的调研参照,都有很丰富的学术课题。

第五,探索以土著方国社会形成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变迁与区域文明起源。结合新石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探索史前文化发展进程中不同区系或族群文化中心的形成与宏观分布格局,立足于史前至历史早期阶段微观聚落形态的调查研究,探索新石器时代土著社会的复杂化进程,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土著方国社会的发展状况。通过比较研究,寻找不同方国的社会形态、方国之间的互动关系,青铜与早期铁器文化的起源、方国文明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周汉文明、印度与伊斯兰文明等因素影响等。

第六,进一步开展土著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因素的发掘与研究。华南东南亚区域土著文化特色鲜明、丰富多彩,而且自史前至历史时代延续发展、多民族跨文化传承,土著民族创造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因素在人类文化史占有特殊的地位,如有段有肩器物传统、印纹陶与原始瓷技术、铜鼓与冶金术、原始舟船与航海技术、树皮布、纹身与裸体、特殊的山水神灵与土著信仰等,都有很多重要的文化史课题。

总之,华南与东南亚民族考古还有很多有价值、有潜力的学术课题。我们应站在跨界文化圈的立场,突破现有的国界与行政区划,通过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重建人类文化史上这一特殊时空的土著历史。我们还要多做跨文化传承的研究,在重建土著文化发展史的基础上,重视跨民族的文化融合与变迁,在中古至今的多民族文化格局中钩沉土著民族文化的跨文化积淀。我们要发挥民族考古的潜力,不忘考古学调查研究的基础方法,更应挖掘近现代土著民族志的深厚的历史讯息,开展民族文化的历史分层与类比研究。



民族考古

本期导读

一、《黎文化的考古启示》

海南黎族作为华南沿海重要的海岛原住民，曾先后引起中外民族学者的关注与调查，但少见考古学者对黎族的专题调查。邵望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黎文化的考古启示》一文是她二十多年前在白沙、昌江、东方等黎族村寨的调查记录，留下了许多前人没有涉及或少涉及的珍贵资料。比如在“村寨聚落”上，她的重点不在“干栏式”、“船型屋”等前人常说的物质文化，而是深入观察广场、住屋、仓房、道路等内在布局，依次围绕村寨的菜地园圃、经济作物林、次生林、原始森林等外在环境“带”，抓住了人群的“活动形态”，深刻、独到；又如“葬俗与宗教信仰”，她所记录的独木棺入殓、墓地中前后墓葬“挖破”关系、凶死者俯身葬背插竹签、住屋门口保留无主老坟并树石板涂白粉等，都极有“新意”。这类细微的观察、体现考古学家独特视角的资料，文中还有很多。

二、《台湾屏东高士排湾旧社遗址的研究与思考》

“旧社”是台湾原住民的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是原住民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聚落的迁徙和内涵形态发展的结果，与特定现生族群的口传“记忆”与文化直接关联，是考古学与民族学之间的共同课题。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玛玲教授的《台湾屏东高士排湾旧社遗址的研究与思考》，展示了她在屏东县牡丹乡高士村排湾族“南排”Palilalirao群的Saqaacengalj、Cacevakan、Aumagan等三个石板屋旧社遗址的调查研究成果，着力空间分析，详细记录旧社聚落内不同形态至房舍的位置关系与布局，并通过聚落环境、家屋排列、形态分类、构造特点、文化内涵等，分析三聚落的异同及与“北排”的差异，并思考了考古学旧社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台湾考古学、民族学上价值不菲，在华南其他族群的民族考古学上也有重要的启示。

三、《关于华南东南亚民族考古的几个问题》

《关于华南东南亚民族考古的几个问题》是我给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生上课时的几段师生对话，内容涉及到华南至东南亚这一跨界区域考古研究的理念、方法、内容、课题等，经硕士生吴梦洋、朱芝兰、马天行等整理后，似自成一章，不妨借《南方文物》一角刊出，供学界进一步批评、讨论。

(吴春明)